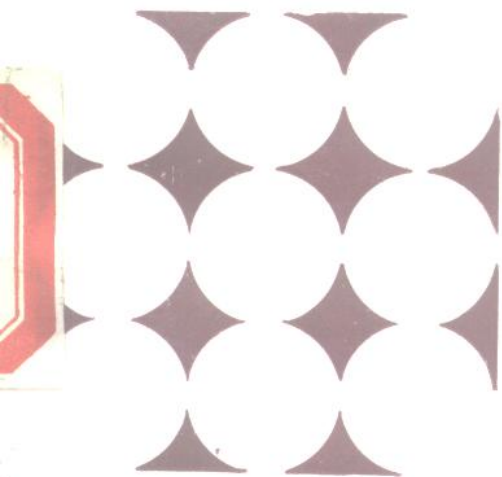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丛书

G 国情与道路

GUOQINGYUDAOLU

顾培根 严永龙 崔俊峰



D0-0/66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丛书

国情与道路

顾培根 严永龙 崔俊峰

解放军出版社

国情与道路

顾培根 严永龙 崔俊峰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12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065-0791-9/D·81

定 价：2.2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依据国情，制定路线，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本书阐明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演变，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及其历史渊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横向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等重要问题。

出版说明

我们向读者推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丛书》，目前国内尚属第一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轮廓。党的十三大报告将这一“理论轮廓”概括为十二条基本理论观点，据此，我们出版了这套丛书，凡十三册：

- 《新的历史性飞跃》
- 《历史大转变的锁钥》
- 《国情与道路》
- 《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
- 《生产力与社会主义》
- 《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
- 《改革·开放·发展》
- 《民主政治·精神文明》
- 《坚持两个基本点》
- 《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
- 《党风与党的生命》
- 《党际关系的新发展》

《和平与发展——当代世界的主题》

这套丛书将陆续付梓，计划1988年内出齐。

这套丛书由本社约请解放军国防大学和总政治部宣传部一些从事理论教学、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同志撰写而成。作者们力图把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状、思想性和知识性结合起来，尝试使丛书既适合军内外青年阅读，又对专业理论工作者有一定参考价值。

书中不当之处，热忱欢迎读者指正。

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6月

序

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作出的历史抉择。

所谓人民的历史抉择，绝不是人们兴之所至，凭着主观意志的“自由”选择。恰巧相反，这是近代历史条件造成的中国的具体国情，使我们与社会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往何处去？这是近代历史摆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面前的严峻考题，困扰着我们几代的仁人志士，就象人面狮身女妖斯芬克司难猜的谜，答错了是要被吃掉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事变表明，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封建制度敌不过帝国主义坚船利炮，在西方文明面前败下阵来，继续闭关锁国，拒不变革是不行了；发展工业交通，建立民主政治，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怎奈是一厢情愿，封建顽固势力不答应，西方的“老师”又总是欺负“学生”，几经努力，走不通。

出路在哪里？中华民族在黑暗中摸索，中国人民在痛苦中沉思。

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的路！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可见，是近代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差”，在

它们交汇时发生激烈碰撞，挤压着中国只有走这一条道路。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

道路选定了，方向明确了。但是，历史之路荆棘丛生，坎坷曲折。

中国的革命在挫折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我们犯过右倾错误，以后又几次犯过左倾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以后，我们面临着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课题。

有了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我们曾经希望社会主义建设能够比较地顺利一些，花费的代价低一些。但是，历史的进程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建国以后30多年的历史呈现出一个大马鞍型，又出现了大的曲折，我们再一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建国后的头七年是好的。在以后的长时期内，左倾错误日趋严重，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几乎断送了的社会主义事业。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又经历了两年徘徊，直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社会主义事业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是两个很不相同的历史时期。但历史在某些方面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思想认识根源来看，可以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课题面前犯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经犯过的同类性质的老错误。

“同”在哪里呢？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上，同在对本国国情的了解若明若暗上，同在对中国革命或

建设的特殊规律缺乏真切的研究上，同在主观指导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本国的国情，因而，同样找不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或建设的具体道路。

挫折是一副苦涩的清醒剂，错误是一所特殊的大学校。

“学费”是昂贵的，但两个历史时期的严重错误都换来了认识上的历史性飞跃。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成熟起来，懂得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要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经过反复探索，逐渐认清了中国独特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的规律，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礼炮轰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对建国30多年来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的再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理论观点。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现在，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国的基本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三者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比起以前是深刻得多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当时特殊的国情。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也得根据中国当前特殊的国情。我们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预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取得辉煌的胜利。

作者

1988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理论和实践的撞击	(1)
一、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	(1)
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6)
三、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的发展.....	(17)
第二章 历史的遗产和包袱	(25)
一、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	(25)
二、近代的屈辱 顽强的斗争.....	(29)
三、宝贵的遗产 沉重的包袱.....	(38)
第三章 现实国情的二重性	(44)
一、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 但不成熟不 完善.....	(44)
二、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定基础 但生产力 仍然落后.....	(51)
三、有先进的意识形态为指导 但腐朽落后 的意识形态还有较大影响.....	(57)
四、具有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 但现代化水 平还不高.....	(61)
第四章 识国情择道路的磨难	(65)
一、黑暗中的苦斗.....	(65)
二、曲折中的探索.....	(68)
三、改造中的创举.....	(74)
四、建设中的成败.....	(78)

五、为何如此磨难	(84)
第五章 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93)
一、苏联式的	(93)
二、南斯拉夫式的	(98)
三、匈牙利式的	(102)
四、阿尔巴尼亚式的	(106)
五、为何是各具特色	(109)
六、正确看待各具特色	(114)
第六章 根据我国国情 走自己的路	(117)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	(118)
二、党的基本路线和长远指导方针	(122)
三、“中国特色”在实践中开拓道路	(134)

第一章 理论和实践的撞击

我国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理论与实践的撞击迸发出双重效应：30多年来，既有巨大的成就，又有严重的挫折。实践中的成就和挫折与作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什么关系？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否矛盾？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大课题。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就要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要得到对理论的科学认识，就要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渊源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的发展过程作一点必要的历史回顾。

一、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

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观，又是一种思想体系，如今，又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

对理想的憧憬和追求是人类的一大特点。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其它动物有自己的某种“理想”并且有对理想的“追求”。但是人有自我意识并且意识到了自我。“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恩格斯语），人总是不满足于单纯地适应外界，不满足于现状，而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力求去改变和支配外部世界，去改善和创造适合自己

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憧憬着自己心中的理想，执着地追求着未来。

古代社会就提出过种种理想的社会观。

最初的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劳动产品仅仅够维持生存，实际上受着自然的奴役。人类很早就产生了许多美好的神话，传说宇宙中有诸多具有神异法力的神祇。人们希冀得到神助或自己获得神力，以支配自然、驾驭自然，使生活美满幸福。这些神话自然还谈不上是什么理想的“社会观”，但是否可以说，其中就寄托和表达着人们最初的某种追求和向往。

在我国历史上较早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观就是“大同”世界。

据《礼记·礼运篇》记载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的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脩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理想社会观当然不必牵强附会地往社会主义上挂。但其中提出的天下为公、选择贤能、尊老爱幼、各有所养、和睦互助、社会安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世界大同等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发生着重大的影响。我国近代改良主义者康有为写的一本表达他社会政治思想的著作就起名叫《大同书》。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借用过“大同”这个概念，把实现共产主义叫做到达“世界的大同”。

晋陶渊明（公元365—427年）的名篇《桃花源记》，实际上也是表现作者对现实社会不满，追求自己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社会。在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没有战乱，没有剥削，村人“怡然自乐”。只是这种反映农民小生产要求的理想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无处可寻，而只是“世外桃源”！

与我国历史上提出“大同世界”大体上相当的时期，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提出了他的理想社会观。他在《理想国》这一著作中，提出要建立至高极乐的共和国，在其中财富公有，没有贫困，没有对立，没有暴力，确立公正原则，实行男女平等等。但在他的“理想国”中仍然分等级，而且他说的“民”并不包括奴隶，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奴隶制的贵族共和国，远不是全人类的解放和平等。柏拉图的理想社会观在历史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对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潮产生过很大影响。

古代的理想社会观都是不现实的，不可能实现，也没有实现过。

古罗马帝国的灭亡意味着欧洲奴隶社会历史的结束，进入了封建社会。经过中世纪漫长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又逐渐孕育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反映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发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逐渐遍及西欧各国。文艺复兴并不是古希腊、罗马奴隶制文化的复活，而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提倡人性，同以神为中心的封建教会思想相对立，有它的进步意义。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势力逐渐壮大，封建专制主义

愈益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资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成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映这种要求，出现了近代“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标志的理想社会观。这种社会观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等都是天赋的人权，建立这样的国家才合乎“理性”和“正义”，因此这样的国家才是“永恒”的理想社会。

这种理想社会竟然真的实现了。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它的实现，马上严酷地揭示了它的实质：这种理想社会，只有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自由”和竞相发财的“平等”，至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则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受剥削的“自由”。它绝不是什么“正义的”、“永恒的”全人类的理想社会，而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王国。

正是在封建社会崩溃，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大背景中，出现了近代社会主义思潮。

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公元1478—1535年）和意大利人托马斯·康帕内拉（公元1568—1639年）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潮早期的代表人物。英国的莫尔在1516年出版了一本叫做《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又有趣的金书》，这本书后来闻名于世，简称《乌托邦》。“乌托邦”一词流行至今，几乎成为称呼种种空想社会观的同义词。意大利的康帕内拉在162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太阳城》的书。《乌托邦》和《太阳城》还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形态，而是以文学的笔触，描绘海外有一个仙岛，叫“乌托邦”，或有一个国家，叫“太阳国”。那里有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如在莫尔的“乌托邦”中，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劳动，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劳动时间很短，余暇时间用来学习，从事科

学、艺术、体育活动，娱乐和休息。劳动所得集体所有，共同享受。过集体生活，在办得很好的公共食堂里吃饭。用不着交换，因此没有货币，黄金用来做罪犯的镣铐。官吏由选举产生，可以时常更换，也没有什么特权。没有战争，没有暴行，没有偷盗。环境优美，花果繁茂，秩序良好，社会安定。人们平等、和睦、幸福地生活。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经历了家庭手工业、手工工场和机器大工业三个时期。莫尔和康帕内拉正处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家庭手工业时期，他们的思想不能不带有这一时期的烙印。如在莫尔的“乌托邦”中，还是以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因为当时还没有机器大工业。在“乌托邦”中甚至还有奴隶，以从事粗笨、肮脏的劳动。由于历史的局限，莫尔或稍后的康帕内拉都不可能科学地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只能局限于揭露和谴责他们已经看到的资本主义罪恶，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描绘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因此，这种社会理想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发展的初级形态。

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发展的高级形态。法国的昂利·圣西门（公元1760—1825年）、沙利·傅立叶（公元1772—1837年）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公元1771—1858年）是这个时期的著名代表。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通常所说的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以下简称为“三大空想”。）

三大空想可以说是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顶峰。三大空想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已经能够用理论形式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相当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超越了在他们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小

生产的和平均主义的要求，主张在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社会。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设计了相当具体的未来社会的模式。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莫尔，但只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本主义产业革命时期，才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正式诞生，才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为“第一批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谈到这三个人的空想观点时称之为“社会主义创始人”。^①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仍然只能是空想的。

从上面的简述中我们看到：第一，对更加美好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始终不渝；第二，从古代的理想社会观到近代社会主义思潮，中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有着历史继承性；第三，各个时代的“理想”社会观，在后人看来都是不理想的，因而是不断变异的，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理想社会；第四，人们的理想社会观，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是时代的产物。

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怎样理解这个“变成”呢？它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又发生了“变异”。三大空想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科学社会主义是对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7页，第3卷第409页。